

January 2013

On Liu Gangji's Practical Ontological Aesthetics as an Advance of Practical Aesthetics

Liyuan Zhu

Wenyong Zhang

Follow this and additional works at: <https://tsla.researchcommons.org/journal>



Part of the [Chinese Studies Commons](#)

Recommended Citation

Zhu, Liyuan, and Wenyong Zhang. 2013. "On Liu Gangji's Practical Ontological Aesthetics as an Advance of Practical Aesthetics." *Theoretical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Art* 33, (1): pp.68-75.
<https://tsla.researchcommons.org/journal/vol33/iss1/10>

This Research Article is brought to you for free and open access by Theoretical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Art. It has been accepted for inclusion by an authorized editor of Theoretical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Art.

实践美学的重要推进

——略论刘纲纪先生的实践本体论美学

朱立元 章文颖

摘要:上世纪80年代,刘纲纪先生在对机械、直观的唯物主义进行反思和批评的过程中提出和建构了实践本体论美学。他重新阐释了马克思主义实践观,把主客体共同参与的“实践”从认识论提到了本体论的高度,突破了主客二分的思维模式,超越了迄今仍然被某些学者坚持的未脱离旧唯物主义窠臼的物质本体论,不但对马克思主义实践美学具有重大的推进作用,而且对整个中国当代美学的建设和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实践本体论 刘纲纪 美学 马克思主义 物质本体论

作者简介:朱立元,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主要为文艺学、美学,具体包括文艺理论和美学理论、西方美学、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西比较文论和美学等。电子邮箱:wwyingb@yahoo.com.cn

章文颖,复旦大学中文系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文艺学、美学,主要包括西方美学理论、西方文艺理论和艺术理论等。电子邮箱:zwysanghai@hotmail.com

Title: On Liu Gangji's Practical Ontological Aesthetics as an Advance of Practical Aesthetics

Abstract: In 1980s, Liu Gangji put forward and established practical ontological aesthetics as a result of reflection and critique of mechanistic and perceptual materialism. He re-interpreted the Marxist view of practice as that which is participated by both the subject and the object, and elevated practice from epistemological level to ontological level. In this way, his conceptualization surpassed the dichotomy between subject and object and transcended the material ontology in the track of old materialism which to this day is still followed by some scholars. Liu Gang Ji's concept of practice not only initiated an advance in Marxist aesthetics of practicum but also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establishment and development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aesthetics.

Key words: practical ontology Liu Gangji aesthetics Marxism material ontology

Author: Zhu Liyuan is a professor at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Fudan University. His academic research focuses on theory of literature and arts, aesthetics, with an emphasis on literary theory and aesthetics theory, Western aesthetics, Marxist literary theory, and comparative studies of aesthetics and literary theory. Email: wwyingb@yahoo.com.cn

Zhang Wenying is a Ph. D. candidate in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Fudan University. Her research interests cover aesthetics and literary theory, focusing on Western aesthetics, Western literary and art theory. Email: zwysanghai@hotmail.com

刘纲纪先生是当代中国实践美学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上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的几次重大的美学讨论中,刘纲纪先生与朱光潜、蔡仪、李泽厚、高尔泰、马奇、蒋孔阳等美学前辈一起参与了美学理论的争鸣与构建,为马克思主义美学、特别是实践美学在中国的形成、阐明和地位的确立做出了重要贡献。他本人在此过程中也逐渐形成了自成一家的实践本体论美学理论,有力地推进了马克思主义实践美学的发展。

一、把实践提到本体的高度

刘纲纪先生的实践本体论思想是一个包含哲学、美学、艺术理论三方面内容的完整体系,三者相互关联、互为整体,这个理论体系的核心与基础就是作为本体论的实践观。

早在上世纪50年代,纲纪先生就开始与李泽厚先生一起就马克思主义实践观在美学中的重要

作用进行研究和论证。^①八十年代他发表了第一篇论述马克思主义美学思想的论文《关于马克思论美——与蔡仪先生商榷》。此文与其说是对蔡仪先生美学观点的争鸣,不如说是以此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实践本体论美学的基本立场。随后纲纪先生又发表了一系列重要的论文,如《关于美的本质问题》、《从劳动到美》、《略论“自然的人化”的美学意义》、《从美的哲学分析到心理学和社会学的分析》以及《美——从必然到自由的飞跃》等,对相关问题进行了反复的、深入的论证,使他的实践本体论美学思想得到了更为明确而严谨的阐释。

纲纪先生的美学研究是建立在他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基础之上的。他秉承传统的哲学研究的理路,一心关注世界宇宙的根本问题,坚持从哲学的最高和普遍的问题入手,对世界万物的终极存在这一根本问题——本体论问题——进行深刻的追问,不满足于现象层面的解读和描摹,而是要探究寓于杂多中的统一的实质。^②在他看来,这个统一的实质就是以“物质”为前提的生产实践活动。应当指出,纲纪先生就是从人的实践活动切入,确立其哲学本体论立场,在国内较早把实践提升到本体的高度,建立起实践本体论美学的。这在当时乃是空谷足音,走在了时代的前列。

纲纪先生对实践观点的论述与众不同,主要是通过世界形成的基础——“物质”概念的独特阐释入手的。与直观和机械的唯物主义不同,纲纪先生认为,马克思所说的“物质”应该包含两层涵义:“其一,指在人类之前就存在的,并且产生了人和与人的精神相联系的人脑的自然界;其二,指在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被人类所改造了自然界,人类改造自然界的实践活动,以及和这些活动相关的一切客观实在的东西”(刘纲纪,《艺术哲学》61)。可见,在纲纪先生看来,所谓的“物质”绝不仅仅是指孤立和独立于主体之外的自然界客观存在,而是包括与人类主体发生联系的自然及与其有关的一切人类活动和产物。因此,“物质”是指包含主客体因素在内的广义的自然,“决不仅仅是指人类之前存在的自然界,也不仅仅是指人所改造了的外部自然界,而是把人类改造自然界的实践活动以及与之相关一切客观实在的东西都包含在内”(刘纲纪,《艺术哲学》61)。这里,纲纪先生重新界定了马克思主义哲

学中“物质”概念的内涵,使“物质”不再是独立于主体、与人无关的抽象的“物”,而是与主体及其实践活动有着密切联系的物质存在。它包括,已经或将要与人发生关系的自然界、人类物质生活以及人类改造自然的物质活动三方面的内容,其中,自然界是基础和前提,三者共同为世界的最初的本原。经过这样的阐释,“物质”概念不再是单纯的、外在于人的纯粹物质性“实体”或者实体化的“物质”了,而是包括人的实践活动在内的实践化了的物质存在。纲纪先生对物质概念的这个重新界定和解释,在当时不仅是独具一格的,而且是石破天惊、意义重大的。同时,这也为他建立实践本体论设置了逻辑前提。

那么什么是“实践”呢?纲纪先生也作了明确的界定,他说,实践首先是“改造自然的感性现实的活动,即物质生产劳动”(刘纲纪,《艺术哲学》127)。对于这个界定的内涵,纲纪先生作了以下的具体阐释:

首先,他认为,“实践”是指人使用工具有意识地改造自然的物质生产活动,即劳动。这样就将实践与人的其他活动区分开来,特指人类为了物质需要而进行的生产活动,使物质生产活动成为本体。其次,他强调“实践”具有鲜明的社会性。在实践中人不是孤立的主体,而是始终处在人与人的群体关系中。因此实践虽然是以客观物质为前提,但同时拥有重要的属人的特性。因为人的物质生产劳动从来都不是孤立的,而是在有一定社会关系的人群中共同实践的社会性活动。生产劳动的社会性决定了人的社会性:人作为主体在实践过程中不是孤立的个体,而是与社会、群体、类紧密相关的。“实践”的社会性是纲纪先生反复强调的,这在他展开自己的美学和艺术理论时具有重要作用。再次,他认为“实践”不是单纯的外在客观实体,也不是单纯的人的主观活动,而是建立在客观物质前提之上的人的有意识活动,是主客体的统一。现实世界既是作为主体的人的物质和精神活动的前提和基础,同时也是主体实践活动的对象、手段和产物,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社会物质条件。人作为实践的主体,既是自然的一部分,又是具有意识的主体,对自然进行创造性的改造,既自在又自为。又次,他对“实践”范畴的核心“劳动”概念的含义,较之直观唯物主义也有着更为深入的理解。他认为,“劳动”不只是一

一个纯粹客观的、功利的概念,而是沟通主客体之间联系的一个重要环节,是主体得以在客体中实现自己精神力量的方式,也是自然得以回应主体思维的现实通道,主客体之间的交换以“人改造自然以满足人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需要”(刘纲纪,《关于马克思论美》53)的物质生产活动为起点,并不断深化,这就是“劳动的本质”,也就是“自然的人化”和“人的对象化”(刘纲纪,《关于马克思论美》53)。劳动的本质就是人区别于动物的本质,在于人能够按照自己的需要(包括物质的和精神的两方面)通过劳动来改造、支配世界,使自然“人化”,既使人的本质力量(也包括物质的和精神的两方面)对象化,同时也使人的本质力量(物质与精神)不断得到提升、发展和完善。因此,“劳动”不仅可以满足物质上的功利需要,更为人类现实生活开启了不断飞跃的精神向度。

根据上述对物质和实践的阐释,纲纪先生提出了自己的本体论主张。他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体论可以分为自然本体论和社会本体论,这两个本体论一体两面,结合点就在于人类的感性实践活动。这样,纲纪先生实际上把作为活动和关系范畴的实践,而不是抽象的、实体性的物质,提升到了本体的高度。

我们认为,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理论突破。这不仅在上世纪八十年代,而且直到今天都具有不可低估的重要意义。因为有的学者直到前不久还在批评“实践本体论”经过多年的探讨和争论,已经被认定为是一种站不住脚的“非本体论”思想,而且指责它是唯心主义观点。他们认为本体论的“本体”是指事物最原始、最基本的“实在”,但实际上却按照直观唯物主义的观点,认定这个“实在”只能是抽象的自然物质的“实体”,并武断地宣称这是不能随意改动和编造的“规定”。据此,本体论中的本体只能是抽象的自然物质实体。然而,这种“物质本体论”恰恰是一再受到马克思批评的。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唯物主义观点,世界只能是“人的世界”;^⑤决定世界的“最终实在”,决不是抽象的自然物质“实体”,而只能是作为人与自然的“关系”和“活动”范畴的实践及其产物“人化的自然”。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中,马克思说:“有意识的生命活动把人同动物的生命活动直接区别开来”

(马恩,《全集》3:273),这种“有意识的生命活动”就是劳动实践,“劳动这种生命活动、这种生产生活本身对人来说不过是满足一种需要,即维持肉体生存的需要的一种手段。[……]一个种的整体特性、种的类特性就在于生命活动的性质,而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恰恰就是人类的特性”(马恩,《全集》3:273)。由此出发,《手稿》提出了劳动是世界历史发展原动力的实践本体论观点,指出,“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是自然界对人来说的生成过程”(马恩,《全集》3:310),这难道不是把劳动实践作为世界“最原始、最基本”的“实在”即“本体”吗?马克思还把人类的劳动概括为“工业”,“因为全部人的活动迄今为止都是劳动,也就是工业,就是同自身相异化的活动”(马恩,《全集》3:306—07);强调“工业的历史”“是一本打开了的关于人的本质力量的书”(马恩,《全集》3:306),“工业是自然界对人,因而也是自然科学对人的现实的历史关系[……]在人类历史中即在人类社会的形成过程中生成的自然界,是人的现实的自然界;因此,通过工业——尽管以异化的形式——形成的自然界,是真正的、人本学的自然界”(马恩,《全集》3:307)。显而易见,马克思的本体论思想恰恰是把作为自然界对人的“现实的历史关系”的劳动实践看作本体的。这是一种“社会劳动本体论”,或者换一种说法就是“实践本体论”。

可贵的是,纲纪先生在二十多年前就按照马克思的思想,以一种独立的方式提出和阐释了自己的实践本体论思想,把实践提升到了本体的高度,这比之于今天还在执意批判实践本体论的学者来,不知道要高明多少!

二、对物质本体论的超越

持有“物质本体论”的学者批判“实践本体论”最主要的理由是“否定物质先于意识”,陷入唯心主义。其实,它在一开始就把物质的先在性(世界的本源性)看成了 ontology(本体论或译存在论)的核心问题;同时,又把本体论(存在论)主要看成讨论世界与人的认识、物质与意识的关系即认识论的问题。而这一方面歪曲了实践本体论的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点,另一方面把本体论(存

在论)的核心问题即一切存在者(包括自然和人)的终极存在问题遮蔽了。

纲纪先生的实践本体论对物质本体论的超越,首先表现在突破了物质本体论把寻求作为世界本源的物质实体的传统本体论思路,纠正了把物质的先在性(世界的本源性)看作现代本体论(存在论)核心问题的错误。纲纪先生的实践本体论虽然强调实践的本体地位,但是在世界的本源问题(而非现代本体论核心问题),即恩格斯归纳出来的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什么是本原的,是精神,还是自然界”这个基本问题上,仍然坚持客观物质世界对于人和人的意识的先在性。他说,“毫无疑问,马克思主义哲学充分承认在人类出现之前整个自然界就存在着,人类所生活的世界是一个不以人的意识为转移的物质世界”(刘纲纪,《艺术哲学》316)。但是,这并不是对现代存在论(本体论)核心问题的回答,因为它根本没有触及实践是人的基本存在方式这个马克思主义存在论(本体论)的基本观点。诚然,马克思肯定在人与自然界的关系中,“外部自然界的优先地位仍然会保存着”(马恩,《选集》1:77),但马克思紧接着强调,“这种区别只有在人被看作是某种与自然界不同的东西时才有意义”(马恩,《选集》1:77)。就是说,这种优先性或者物质的先在性只有在人已经和自然(物质)区别开来、并将后者作为认识和实践的对象时才有意义,不能像费尔巴哈和今天的物质本体论者那样离开了人抽象地谈论自然界、物质的优先性。因为,“先于人类历史而存在的那个自然界,不是费尔巴哈生活其中的自然界;这是除去在澳洲新出现的一些珊瑚岛以外今天在任何地方都不存在的、因而对于费尔巴哈来说也是不存在的自然界”(马恩,《选集》1:77)。这种离开了人的实践的自然界或者物质完全是抽象的、现实世界中不存在的。人的实践“这种活动、这种连续不断的感性劳动和创造、这种生产,正是整个现存的感性世界的基础,它哪怕只中断一年,费尔巴哈就会看到,不仅在自然界将发生巨大的变化,而且整个人类世界以及他自己的直观能力,甚至他本身的存在也会很快就没有了”(马恩,《选集》1:77)。这清楚地说明,现存感性世界的基础是感性劳动和生产,即实践,只有在实践中,整个感性世界,包括人和自然界的如此这般的存在,才显现出来。倘

若劳动实践一旦中断,“整个人类世界”,包括每个人都将不复存在。对于用世界的本源问题来取代人与世界如何存在的现代本体论核心问题的抽象的“物质本体论”,马克思进行了深刻批评,指出只有“当物(die Sache)按人的方式同人发生关系时,我才能在实践中(praktisch)按人的方式同物发生关系”(马恩,《全集》3:304),物质如果不“按人的方式”即实践方式同人发生关系,根本无所谓先在性、客观性,又何谈“本体论”意义?!纲纪先生的实践本体论正是高瞻远瞩,“站立在人类存在和发展的现实基础即人类物质生产的基础上去历史地观察和解决物质与精神、存在与意识的关系,而不仅仅局限在从自然科学上去回答两者谁是第一性的问题”(刘纲纪,《艺术哲学》56)。与物质本体论根本不同的是,纲纪先生的实践本体论把主体(人)参与的物质生产劳动作为决定人类历史生成和发展的关键。人类不再是束缚于自然规律和物质的必然性的奴隶,而是可以在不断地与自然交往、改造即实践的过程中,认识和掌握自然规律来实现自己的目的。

应当指出,纲纪先生在强调实践的本体论意义时,并没有夸大主体精神对物质的能动作用、否定物质世界对主体精神的制约作用,但是他明确指出,即使如此,也不能否认“物质对精神的作用是通过人对物质世界的实践改造而表现出来的”(刘纲纪,《艺术哲学》60),归根结底还是不能离开实践来抽象地谈论物质决定精神,因为所谓的物质对精神的决定作用也正是在当物质与主体发生了实践关系的时候才具有真正的意义。如果按照物质本体论的思路,主体与客体处在二元对立之中,人类受制于、决定于自然界的规律和必然性,只能被动地遵守和反映,而没有能动的改造和创造,就必然会陷入对物的崇拜、顺从,最终导致自然和物的神化,走向神秘主义的虚妄。

纲纪先生的实践本体论对物质本体论的超越,还表现在突破了长期以来一些人仅仅停留在认识层面上解读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局限性。他说,过去“我们虽然也重视实践,但在多数情况下只强调它是认识的源泉和标准。这固然是正确的,也是很重要的,但我们往往忽视了实践同时还是改造世界的一种能动的物质力量,忽视了我们生活的周围世界是由我们的实践所改造和创造出来的,忽视了物质世界对人之所以有意义、价值,

全在于它是人实现他的生活,发展他的个性、才能的对象、手段和工具”(刘纲纪,《艺术哲学》129)。这就是说,他认为实践,不仅仅是认识论的范畴,而且更是、或者说首先是本体论(存在论)的范畴。

纲纪先生认为,仅仅在认识论范围内来理解实践,把实践只作为认识的一个条件来看待,是一切旧唯物论(物质本体论亦属于此)的重大局限。他根据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实践唯物主义思想,指出旧唯物论把感性世界,包括事物、对象、现实和社会生活之中的各种关系都当做直观的形式去理解,将客体看作是完全独立于主体的客观存在,而把实践活动的重要性仅仅看作认识论意义上对感性世界认识的基础和检验。纲纪先生批判了这种将实践单纯认识论化的观点,正确地指出,实际上,旧唯物论恰恰在问题的根源处忽略了一个关键点,那就是所谓客观存在的感性世界本身就是主体参与活动的实践的产物,“人所生活的感性世界是人的实践所创造出来并不断在改造着的世界”(刘纲纪,《关于马克思论美》55)。进而鲜明地提出,实践作为事物的本体是第一位的中心问题,其次才可以谈论作为认识论意义上的实践的作用,因为正是“由于实践是人改造世界的活动,所以它才能成为认识的基础和检验真理的标准”(刘纲纪,《关于马克思论美》55)。旧唯物论颠倒了作为“本体”的实践与作为“认识”的实践何者更为根本的关系,从而割裂了主体与客体之间活泼泼的联系,陷入了机械唯物论的泥潭。纲纪先生对旧唯物论的上述批评,现在看来,完全适用于对物质本体论的批评,也显示出他的实践本体论对物质本体论的又一重要超越。

总之,纲纪先生的实践本体论在以上两个方面有力地批评和超越了物质本体论,使实践范畴同时超出了传统本体论的实体化思维方式和单纯认识论的范围,上升到本体论的地位,为马克思主义实践美学的深入发展理清了脉络,拓宽了思路。

三、实践本体论美学的新思考

刘纲纪先生的美学思想与他的实践本体论哲学思想是相统一的,是他将实践本体论思想运用于解决美学基本问题的思考与尝试。与那个时代绝大多数的美学家一样,刘纲纪先生也把探寻美

的本质看作美学研究的核心问题,他认为“要建立一种有严密系统的美学[……]不能不深入地研究美的本质问题”(刘纲纪,《美学与哲学》14)。从实践本体论出发,他不同意将物质与精神割裂开来探究美的本质,认为美是思维与存在、物质与精神、必然与自由相“统一的感性表现”(刘纲纪,《美学与哲学》25)。而这几方面统一的基础就是实践。由此出发,纲纪先生将“美”界定为“以实践为基础的,超出了生存需要满足的,人的个性才能的自由发展的感性表现”。^④下面我们就试对纲纪先生这个界定,结合他的实践本体论,作初步的阐发。

1. 美与实践

刘纲纪的美学思想不同于之前的客观论、主观论以及主客同一论美学,而是坚持物质自然为前提的实践本体论。从他的哲学理念出发,认为美是人类实践的产物,是人的对象化,是主体自由在对象上的实现。“实践”不仅仅是人获得审美能力的手段,其本身就是美之所以产生的根源。实践不仅在主体审美能力的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有效,而且是从一开始就贯穿了美的全过程,因为审美对象首先是实践的产物,其次才是审美的对象。

那么“美”是如何通过实践来产生的呢?让我们来看“实践”的基本内容——“劳动”对美的作用。刘纲纪认为,劳动都是主体出于自己的目的或自身的需要对外界自然进行的合目的性的改造,“劳动既是满足生存需要的活动,同时又是能够支配自然的必然性,从自然取得自由的活动”(刘纲纪,《美学与哲学》78)。因此劳动、劳动产品及劳动过程本身对于人来说就具有了双重的意义,一方面劳动是迫于单纯的生存需要,带有外在的强制性,能够带来生理性质的快感;另一方面,则是作为劳动主体的人提出的目的及其实现,对于这个目的,人自身就怀有兴趣,并为这个目的的实现而产生愉悦的情绪。这种精神上的愉悦与前一种生理上满足的快感有着本质的不同,它具有内在的、自发的、超越物质需要的属性。因为劳动者为达到自身的目的而进行的克服自然的必然性的劳动本身是一个艰难的过程,需要劳动者运用自己的智慧和才能来达到目的。因此最终产品实际上就是劳动者自身能力外化于自然的表现。劳动的本质是人的自我实现,劳动在满足生活需要

的同时,主体通过掌握和运用自然规律,使自身的自由意志得以在对象上实现。通过生产劳动,“实践”将原先外在于主体的“自在之物”不断转化为与主体有密切关联的“自我之物”(刘纲纪,“自然的人化”28),主体的本质力量也不断地在被改造的自然物上实现来达到目的。实践使人摆脱了必然王国的束缚向自由王国飞跃,从而在精神上获得了征服自然、肯定自我的愉悦感。“这种精神愉快就是从劳动中产生的最初的美感,它来源于人对自然的支配,产生于人对他在劳动的过程及其产品上所表现出来的自由的直观”(刘纲纪,《美学与哲学》78)。因此,美不是主体对外在事物的客观属性的评价,而是对主体自身自由本质力量的肯定和赞美。我们认为,纲纪先生这里并不是在对美的本质作静止的、实体化的界定,而实际上是对美的产生、起源的动态探讨,是对美得以形成的根源的发生学阐释。其中,不存在固定的永恒不变的美的本质,而只有美的不断生成过程的原动力——劳动实践——的揭示。

但是,纲纪先生同时指出,对美的实践本体论的理解不能僵化和公式化。物质生产实践是根本、基础和本原,这并不是说人和人的生活只包含同劳动有关的东西,也不是说所有的美的内容都必须处处归结为劳动。恰恰相反,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人类闲暇时间的获得,物质生产劳动在人类生活中所占的地位和比例越来越小,精神生活的比重却逐渐加大。同样,劳动所产生的精神愉悦与生理快感经历过一段漫长的历史的发展之后从最初的混而为一变为逐渐分离,美于是获得了自己的独立性。美根源于劳动实践,并通过进一步的实践有了新的形态和性质。这进一步肯定了美在实践发展中范围不断扩大、形态不断更新的变化趋势,在某种程度上肯定了美的生成性、过程性,而否定了美的现成性、固定性。

2. 美与“自由”

如上所述,马克思把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定位于人的生命活动——劳动——是人的自由本质的实现。纲纪先生遵循这一基本观点,认为在美的产生过程中,如果说物质生产劳动是客观基础,那么人的自由本质的力量及其实现则是决定美之所以能通过实践对人形成的决定性要素。因为如果不具有“自由”本质,那么也就无所谓劳动产生超物质需要的精神满足,无所谓美了。

那么什么是“自由”?为什么自由是美形成的关键呢?纲纪先生认为,马克思主义的“自由”是在认识和掌握客观必然性的基础上,为了实现人类自身的生存和发展的需要的目的对必然性的支配和改造,它通过创造性的劳动来实现。纲纪先生对自由的解读,基本上限定在通过创造性劳动对自然的必然规律支配的范围之内,不是精神的天马行空式的无限自由。与李泽厚先生的实践美学不同的是,纲纪先生认为实践活动是主体的创造性劳动,而不仅仅是自然的人化。实践之所以能成为美和艺术的本体,关键也都在于劳动的这种创造性中。在实践中,主体通过创造性劳动来实现对客观必然性的认识和实际的支配,是自然与自由、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因此创造与自由在刘纲纪美学中是一体两面、不可分割的,是从一般实践过渡到美的关键环节。

纲纪先生辩证而精辟地指出,“自由是创造的产物,创造是自由的表现”(刘纲纪,《艺术哲学》137)。在他看来,劳动本身就是积极的、创造性的活动,劳动克服了物质的障碍,实现目的,实现了主体的自由。马克思主义的“自由”以物质生产劳动为基础,不能脱离自然的必然性,也不能只看到人对必然性的认识而忽视对必然性的改造。因此,美学意义上的“自由”是一个主客体间双向互动的过程,主体既要符合客观规律的必然性,又必须与个体的特殊个性相结合,一定程度上摆脱必然性的束缚,体现出自身的创造性和自由。之所以有美的产生,就是因为人根据自己生存和发展的需要,有意识地改造外部世界,而非本能地被动地适应自然的规律和法则,从而在客体世界中实现自由,“这自由是来之不易的,是他克服了各种困难的创造性活动的成果”(刘纲纪,《美学与哲学》32)。因此,人的生活和外部世界都是他创造出来的作品,除了满足物质的需要之外,人在客体上看到了自己的智慧、勇敢、才能和力量,看到了自己在付出了种种艰辛的努力之后获得属于自己的作品,并在这个作品中看到了自己的本质力量——自由的实现。显然,这是从更深的层面揭示出美的根源。

3. 美与“感性表现”

除了“实践”作为美产生的基础,“自由”作为美得以产生的人的精神本质之外,美还必须具有感性的物质载体。并不是所有实践和自由的产物

都一定是美的,美还与一定的感性形式相关。纲纪先生认为,美的形态无论如何复杂,总包含这样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可以直观到的感性的自然的形式,另一方面是处处透过这种感性自然形式所表现出来的人的自由”(刘纲纪,“自然的人化”31)。美的本质是主体自由的实现,但这种自由的实现必须体现在感性形式之中。

那么美的“感性形式”是如何获得的呢?在这种感性形式中主体精神和客体存在又是如何结合的呢?这就需要主体在创造性的劳动中,将自由的本质通过实践“对象化”到外在的客体之上,使美具有了感性表现的形式。据此,纲纪先生认为,“对象化”是连接“创造性劳动”和“美”的一个关键步骤或者中介环节。对此他作了专门的论述。他指出,“对象化”是主体把自己内心的精神、意愿、要求和目的等本质力量,通过实践转化为客观现实的对象,“是人改造和占有外部世界的一个实践活动的过程”(刘纲纪,《艺术哲学》131)。对象化是一个不断从运动转化为静止,最后形成一个静止的存在物的过程。对象化从动态化为静态,并凝结了抽象的人的自由力量的结晶,成为人的自由的表征物。于是,自然的感性物质形式与人的自由的精神要素结合到一起,形成了美。在这一过程中,主体不但需要认识到客观事物的规律和性质,还要主体发挥能动的创造力去寻找合适的手段去克服障碍,改造和支配外部世界,从而实现主体的目的。这个认识和改造客观事物的过程“同时就是主体发挥他的创造智慧、才能和力量去克服和战胜各种困难的过程”(刘纲纪,《艺术哲学》133)。因此创造必须要有客观物质的对象,必须在对自然客观规律的正确认识和掌握之下,发挥主体的智慧的能动性对其进行改造、运用,达到人类生存和发展的目的。自然的规律间接地成为主体的合目的性,主体不断使“自在的必然”转化为“我的必然”。人的创造活动本身是高度合目的性的,因而对象化的物质载体具有合规律性、合目的性的感性形式。

美的感性形式根源于人类改造世界的实践,是人支配自然的力量直接或间接地在物质客体上的体现。通过实践,产生出了感性现实的客观存在,它显示了人的自由,成为了审美的对象。因此,美不仅仅存在于观念中,而且是必须通过实践获得客观的感性形式。

实践、自由、美的感性形式,构成了纲纪先生在实践本体论基础上论述美的三个关键词,同时,这三个方面的统一也构成了实践本体论美学区别于李泽厚的实践美学和其他各种实践美学学派观点的核心内涵。应该说,在上世纪八十年代,这是对实践美学的重要推进。特别是,实践本体论美学将实践从认识论上升到本体论的高度,突破了旧唯物主义生糙的主客二分的思维模式,将主体与客体统一于实践,超越了迄今仍然被某些学者坚持的未脱离旧唯物主义窠臼的物质本体论,对中国当代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此外,纲纪先生的实践本体论是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不仅应用于他的哲学美学思想,也应用于艺术理论和中国美学史的研究和书写,在当代的中国美学和艺术理论等研究领域都取得了卓越的成就,限于篇幅,本文就不展开了。

当然,由于纲纪先生的实践本体论美学提出的年代较早,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学术界新的理论争鸣的不断发生,实践本体论美学的某些主张和观点,也受到了一些批评和质疑,比如,对“实践”的理解比较狭隘,只限于物质生产劳动,与李泽厚先生的实践观基本一致,而这在实际上将包括审美和艺术活动在内的精神生产和劳动的重要作用排除在“实践”的内涵之外。其实,这些批评本身对于进一步完善和发展实践本体论美学也许不是无益的。相信纲纪先生的实践本体论美学在新的时代一定能够得到新的发展,为马克思主义美学的中国化和理论创新做出更大的贡献。

注释[Notes]

①刘纲纪先生在后来的访谈中回忆了当年参与学术论争的情况,并指出了他本人在实践美学的建构过程中起到的作用。请参见刘纲纪 李世涛:“我参与的当代美学讨论——刘纲纪先生访谈录”,《文艺理论研究》4(2009):44-51。

②刘纲纪先生说“所谓最普遍、最高的本质也有种种不同说法。但其中最基本的问题是:第一,存在的本原问题,即世界从何产生形成,或什么是始初的、第一性的东西;第二,相对无限众多的现象,存在的最一般的根据、实质问题”。参见刘纲纪:《传统文化、哲学与美学》(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72。

③可参见:“黑格尔法哲学·导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版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199-214。

④此定义是在之前提出的美是“人类在他的生活的实践

创造中感性现实地表现出来的自由”这一提法的基础上所作的修改。参见刘纲纪:《艺术哲学》(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6年)343,注释。

引用作品[Works Cited]

- 刘纲纪:《艺术哲学》。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6年。
 [Liu, Gangji. *Philosophy of Art*. Wuhan: Hube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06.]
- :《美学与哲学》。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6年。
 [———. *Aesthetics and Philosophy*. Wuhan: Wuhan University Press, 2006.]
- :《传统文化、哲学与美学》。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
 [———. *Traditional Culture, Philosophy and Aesthetics*. Guilin: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1997.]
- :“略论‘自然的人化’的美学意义”,《学术月刊》4(1983):26-32。
 [———. “A Brief Discussion on the Aesthetic Significance of ‘Humanization of Nature’.” *Academic Monthly* 4 (1983): 26-32.]
- :“关于马克思论美——与蔡仪同志商榷”,《哲学研究》10(1980):52-58。
 [———. “About Marx's View on Beauty: Responding to

Comrade Cai Yi.” *Philosophical Researches* 10 (1980): 52-58.]

- 刘纲纪 李世涛:“我参与的当代美学讨论——刘纲纪先生访谈录”,《文艺理论研究》4(2009):44-51。
 [Liu, Gangji, and Li, Shitao. “The Debates on Contemporary Aesthetics I Have Taken Part In: Interviews with Prof. Liu Gangji.” *Theoretical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Art* 4(2009): 44-51.]
-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版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217-365。
 [Marx, Karl. “Economic and Philosophical Manuscripts of 1844.” *Complete Works of Karl Marx and Friedrich Engels* (2nd edition). Vol. 3. Beijing: Renmin Publishing House, 2002. 217-365.]
- :“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版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62-135。
 [———. “German Ideology.” *Complete Works of Karl Marx and Friedrich Engels* (2nd edition). Vol. 1. Beijing: Renmin Publishing House, 1995. 62-135.]

(责任编辑:王嘉军)

(上接第67页)

结 语

回望历史,立足当下,展望未来,我们已同时看到中国现代文论的成果、不足和希望。中国现代文论的成就尚不敦说巨大,但它的气象格局和胸襟抱负却是雄阔的。历史中的成就需要牢记,因为我们体内奔腾的血脉来自那里,那是无数前辈为现代中国宏大景象书写的伏笔,即便在黑夜也会把我们激励;同时,历史中的教训更需铭记,但那不是为了束缚我们的心灵,而是为了在当今全球多元文化时代,迈向更加坚韧不拔的个体思想解放与民族精神自由。每个历史挫折都会使我们自觉身负更多的责任和驰骋更高远的想象:不断地努力创造属于中国现代文论独有的风景和品格的新天地。

注释[Notes]

①本文系在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课题攻关项目“西

方文论中国化与中国文论建设”(项目批准号05JZD00028)结项报告之结语部分基础上修改而成。对本文写作有贡献的还有何浩副研究员、胡继华教授和胡疆锋副教授。陈太胜教授和陈雪虎教授也参与讨论和修改。特此说明并向他们致谢。

②参见曹顺庆:“文论失语症与文化病态”,《文艺争鸣》2(1996):50-58。

引用作品[Works Cited]

- 梁启超:“夏威夷游记”,《饮冰室文集点校》,吴松等点校。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
 [Liang, Qichao. “Journey to Hawaii.” *Collected Works of Ice-Drinking Studio*. Proofread and ed. Wu Song, et al. Kunming: Yunnan Education Press, 2001.]
- 林毓生:《中国意识的危机》,穆善培译。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86年。
 [Lin, Yusheng. *The Crisis of Chinese Consciousness: Radical Antitraditionalism in the May Fourth Era*. Trans. Mu Shanpei. Guiyang: Guizhou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1986.]

(责任编辑:王嘉军)